

汉语全球教育史研究的国际视野

宋旭东 杜霞阳 徐仪家 方环海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中国 厦门 361102)

摘要: 汉语全球教育史一直是当前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之一,进一步强化对此课题的研究不仅可以完善汉语教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历史框架,同时也可以为当前汉语教学提供借鉴与经验。“汉语全球教育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的研讨内容涉及汉语教材研究、国际汉语传播、汉语本体与教学等多个领域,为当前学术界对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材料。

关键词: 汉语教育; 教材; 汉语本体; 汉学

中图分类号: H19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221-9056(2018)05-0104-18

DOI 编码: 10.14095/j.cnki.oce.2018.05.012

作为聚焦国际汉语教育专题,探索汉语教育全球发展的研讨会,世界汉语教育史研讨会年会至今已举办了八届。2017年10月20日至22日,“汉语国际视野下的汉语全球教育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在中国上海召开。此次会议由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会和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联合主办,结合大会主题,会议邀请了白乐桑、内田庆市、奥村佳代子、胡范铸、范长喜等发表主题演讲,来自中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地1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本届盛会,探讨并宣读研究论文,内容分别涉及了汉语教材研究、国际汉语传播、汉语本体与教学、西人汉语研究、国际汉学等领域。相对于往届的年会,本次大会所包含的内容在研究的题材、参考的理论、探索的角度、应用的方法上都有开拓创新,对共同探讨汉语国际化的历史传承、发展现状和未来方向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一、汉语通用教材研究

近年来,关于汉语教材的研究引起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在本次年会上,共有20余位专家学者就汉语教材的研究做了相关报告,反映了当今汉语教育界对汉语教材的重视。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西平教授和杨少芳以《葡华辞典》当中第003-007页的《宾主问答辞义》为

收稿日期: 2018-04-21

作者简介: 宋旭东, 海外教育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1060614510@qq.com

杜霞阳, 海外教育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444638702@qq.com

徐仪家, 海外教育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2958746985@qq.com

方环海,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西方汉学、认知语言学、汉语国际传播等。

Email: fhuanhai@163.com

感谢《海外华文教育》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中不妥之处概由本人负责。

本次报告的重点。《宾主问答辞义》为罗马注音写成的对话录,几乎为西方汉语史上第一份汉语对话教材。首先,杨少芳指出研究的目的是探讨书中的音韵学方面和注音系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葡华辞典》提供参考。在会议报告中,杨少芳初步说明了《葡汉辞典》的正文和散页的页数、内容、手稿特点以及散页开篇《宾主问答辞义》的重要性,指出当时写作目的是为了学习华语、了解当地风俗进而为传教开辟道路;接着,她比较了《宾主问答辞义》与《葡汉辞典》注音、拼合发音方法的异同,指出《问答》中的拟音参意葡语音拼法及杨福绵《葡汉辞典》声、韵母拟音而成。其次,杨少芳以《问答》与《词典》书中的标音作为例子强调了两书中声母拼法特点、韵母拼法特点以及声调特点。最后报告指出《宾主问答辞义》作为最初的汉语会话教材,它兼顾了内容主题的段落化,日常用语的生动趣味化,以及对欧洲文明与天主教义的科普化呈现。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尽管对于口头传教和社交往来有需求,不过传教士的汉语学习从未只关注口语、不重视汉字,反而是“语文同步”的。透过张西平教授所做的探讨,可以得知,《问答》与《辞典》的语音系统同属汉语罗马字母草创期的成果,是汉语拼音方案的鼻祖。《宾主问答辞义》与《葡汉辞典》的关系,正好似《西字奇迹》与至今下落不明的《汉葡辞典》之间的关系,一部是带有音韵辞典性质的“字汇表”,一部是将“字汇表”应用于口语表达的注音语料。而《问答》除了注音之外,更兼具了最初西人学习汉语官话的会话体教材性质,是同类型中现今可见的第一篇语言文献,开创了其后教内问答体例白话学习教材的先河。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的岳薇对东亚同文书院的汉语教学进行了研究。她指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作为日本在国外开设的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文化教育设施,从1900年至1945年的45年间培养了五千名学生,为中日交往输送了大量人才。大多数毕业生成为了“中国通”,在中国就业、活动。岳薇的报告主要从七个大部分进行研究,其中前三部分分别从东亚同文书院的成立、发展的三个时期、学生和老师的阵容进行了背景介绍,第四部分在重点讲述同文书院的汉语教学安排和授课时数的同时,也指出同文书院的学生通过接收日本外务省资助和旅行,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之中。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社会实践,东亚同文书院的毕业生才能在将来适应各种需要使用汉语的工作。针对高年级的学生,学校开设了汉语特别讲座,使学生不仅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和现状,也可以促进汉语的学习和提高。第五部分则主要是研究同文书院的汉语教材《华语萃编》(共四集)。《华语萃编》各集都是采取以中国人讲师编写原稿、日本人教师协助的形式编写的,称得上是一部在语言上由真正的汉语语汇和表现方式构成的教科书。第六部分介绍同文书院的毕业生就业情况。最后,岳薇从历史意义角度探讨同文书院的价值。东亚同文书院作为日本研究中国的权威机构,奠定了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基础。研究东亚同文书院的汉语教学对研究东亚同文书院的历史,以及中日关系史有重要的帮助,同时也对现在的学校及教学机构开展汉语教学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上海师范大学的何玉洁将穆麟德的《官话学习实用指南》中的《官话必读五十章》与著作信息不全、仅有“穆麟德校刊”字样的会话读本《汉语初阶》进行对比,发现两者有12章内容高度相似,另有3章主题相同。何玉洁也指出,二者的区别在于,《汉语初阶》作为汉语会话读本,口语化色彩浓厚,但其选材较为随意,编教没有突出重点,让学习者无章可循;而《官话必读五十章》编排符合循序渐进原则,针对在华任职西人编排相应教学内容,选材有意涉及中国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紧扣教学目标,同时与教材其他部分环环相扣,互相关联。在报告最后,何玉洁推论《汉语初阶》成书时间早于《官话学习实用指南》,前者直接录入口语对话语料,后者在南北音之间确定以北方官话为教学内容,其课文“官话必读五十章”也是在先前材料的基础上梳理改进。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岳岚则对另一本口语教材《华英联珠分类集成》从编写理念的角度进行研究。据介绍,《华英联珠分类集成》是20世纪初以古安教学法为指导编写的一本口语教材。全书100课,内容分12个方面展开,同一部分下的各课之间形成一个主题,内容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全

书每一课都由十几到二十几个句子组成,占两页篇幅,左页为英文右页为中文。此教材作者 J. Endicott 提倡“句本位”的教学观。鉴于许多中国人对谚语、俗语等如数家珍,作者强调学生应该尽早养成学习谚语、俗语的习惯。该书特别重视口语教学,因此并不建议学生在初始阶段认读汉字,只需听懂并复述句子即可。为了让学生以自然的方式循序渐进地掌握汉语,《集成》并不试图解释语法规则,而是给出恰当的例子。此外书中也有不少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等语料,目的在于补充语料,通过这些语料展示语法、句式、成语等,这也是一种自然的输入方式,这不仅能让学 生掌握汉语知识,而且通过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可以进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但该教材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例如:新理论应用生硬、完全忽视语法和汉字教学、将第二语言教学等同于儿童母语教学等。不过,岳岚指出该教材对当今汉语教材编写也仍有借鉴意义:即注重吸收最新教学理论、注重文化教学、关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强调学习地道的语言、注重方便的形式设计。

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所著的《古汉语语法纲要》原为剑桥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讲义,在 1995 年出版后受到了汉学界的好评,且其与国内的古汉语语法著作有所不同。来自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陶原珂和深圳大学的吴颖霞均对蒲立本的《古汉语语法纲要》进行了研究,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陶原珂对此著作的语法构架特点进行探析,他发现《古汉语语法纲要》语法解释构架的突出特点是以谓语(特别是谓语动词)的构成中心展开论述,这与国内古汉语语法著作以若干词类(如 12 个)并列来展开论述的语法解释框架显著不同。他总结《古汉语语法纲要》以动词为中心的语法构架表现在五个方面:(1)以英语句式要求有动词和主语的结构作为比较项,解释古汉语例句的实际表意,从而揭示古汉语无主句、无动词句的句式表意特点;(2)把古汉语的形容词当作动词的附类,纳入动词范畴解释,并且与及物动词加以比较和辨识;(3)把古汉语的介词看作次动词来解释,解释介词由动词转变为介词的历史发展趋势;(4)从动词的角度来考察修饰动词的副词和古汉语的体的构成;(5)围绕英语的动词语气构成,经比较凸显出古汉语语气的多词类构成特点。同时,陶原珂认为《古汉语语法纲要》配有大量的实例,在每一点语法见解下必给出文献例证,并且蒲立本体味古汉语语句含意相当细致,在用英语作为语言比较项中,其目的不是比附英语的构成成分而在于解释差异,这些使该著作在古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古汉语语法的讲授方面等方面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深圳大学的吴颖霞则提出了《古汉语语法纲要》中的两个问题,她发现《古汉语语法纲要》对小品词未明确界定,随文指涉,且划界不清,身兼二职,例如“将”既是次动词又是小品词,“而”既是连词又是小品词。她还发现孙景涛的汉语译本与原著相比,可能存在个别笔误之处,例如“之”有时似乎应该出现在“以”前面用来复指前置宾语,却被省略了,以及将“夫(例句为:夫尹士恶知予哉)”译释为小品词等。

本次会议上也有专家学者研究了有关古代琉球地区汉语学习的情况。琉球官话课本是清代琉球人学习汉语官话的课本,多以抄本形式流传,保存至今的代表性课本有《官话问答便语》《百姓官话》《学官话》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课本的行间和开头等位置保留了大量的学习者的注记,这些注记主要是针对课本中的难点所做的注音、释义、说明等,涉及语音、词汇、语法、文化等诸多方面。中山大学的范常喜便是从《官话问答便语》所存的注记进行考察,归纳总结了琉球人汉语词汇学习的难点。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书面色彩较重的词语,如雅句、谚语、礼貌套语、委婉语等;(2)口语色彩较重的词语,如日常生活口语、詈骂等;(3)带有方言色彩的词语;(4)生活口语中相对少见的专门词语,如节日用语、礼俗用语、行业用语等。除此之外,范常喜提出,天理本《官话问答便语》所存注记当中还有许多材料可以体现琉球人汉语语音学习的诸多偏误现象,例如送气音与不送气音不分、平翘舌音不分、前后鼻音不分、“h”“f”不分、“r”读为“y”、“zh”“ch”“sh”读作“j”“q”“x”等。从所考察的注记中范常喜指出注记所体现的难点仍然是现在日本人及其他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难点。因此,琉球官话课本注记的研究对现今的汉语学习者难点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

补充作用,值得进一步的考察探究。

台湾地区圣母医护管理专科学校的刘怡伶以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新学制小学汉语教科书》为例,探究商务印书馆对现代汉语教育的建构。在报告中,刘怡伶将探究重点放于选文类别特色(与部定点课程标准对照)、操作面对编次(内容框架及其编辑特色)、文言白话议题(比例配置及呈现的方式)、编辑群背后的编纂意识四大方面。通过收集、归纳教科书的编写体例与文白配置,对比分析初小用和小用课本,刘怡伶指出,新学制小学汉语教科书在原则上遵照部定,但文白配置、篇目选择,各有偏好。在选文特色上,以儿童为中心,注重活泼有趣的现实经验;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大、取材以文学为主;强化汉语的文学,也不偏废民间文学;受杜威实用主义影响,留意应用文类书写;不忽略域外的人事物,有开阔的文化视野;研究相关的教科书可辅助取经于文学史或思想史的研究视野。

上海师范大学的孟娟则重点研究了1960年代新加坡小学汉语教材《说话》的本土特色,在研究报告中,孟娟指出《说话》作为一本主动求变的口语教材,除了插图、词汇(如级长、罗厘车、奎笼、利便等)、课文题目(《巴刹里》《吉隆坡的拓荒者》《林谋盛烈士》等)方面存在本土特色,在句子中的词语以及语法的使用也具有强烈的“本土特色”,比较明显的就是:(1)残缺:在教材中出现了很多缺少句子成分的句型,主要是缺少动词、助词、代词、被修饰词以及量词前的数词等,如我们来游戏;(2)语义混用:教材中出现很多词语,由于一些原因编者不熟悉词语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用法亦或是那里华人的使用现状就是如此,使得教材中出现很多词语混用这样的“特色”现象,如老师,“劳驾”和“谢谢”,有什么分别呢(“分别”“区别”和“不同”词义不明确,造成混用);(3)语序不当,教材尤其是口语教材,句子在语序上有很多“特色”,如:他很热心公益事业;(4)句子赘余以及相关成分搭配不当,句子中有些成分是不必要的,但是编者没有取舍,出现了句子成分赘余。如:着凉可不大要紧,吃点儿药,休息一两天,就会好的。(“可”字多余。)基于上述研究,孟娟最后指出《说话》不管是在插图、词汇还是话题选择都有本土特色,但是成分残缺、词义混淆、语序不当等一系列语法上的“特色”是不利于学习者学习与交流的,即使一些用法在华人群体中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了,学会了此种华语也只能在小圈子里使用,不能走上国际。针对日益引起关注的汉语教学国别化问题,孟娟指出部分符合特色的词汇可以本土化,并且需在教材附录中给出现代汉语中的叫法,语法绝对不可以本土化。

深圳大学的詹勇以张卫东教授研制的《老乞大》版本数据库为研究对象(共收录老乞大十二个版本,及元本、华语本、重刊本、存羊本等),指出《老乞大》历史上长期作为朝鲜人学习汉语的教材,为了使其语言更符合新时期的口语要求,曾不断地被修订、新释、重刊,以致版本众多。这些不同的版本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汉语长达数百年间的变化。他选择不同版本的《老乞大》中的“把”字句、“将”字句、疑问句和比较句等几种特殊句式展开研究,并且对每种特殊句式在不同版本中的使用数量进行统计,进而得出不同版本中的使用倾向。在进行句式分析时,注重与现代汉语的相关句式的比较,以发现其不同的功能特点。通过句式差异的对比分析,管窥元、明、清三代汉语的发展演变情况。在报告中詹勇列出名词、动词、形容词、人称代词、疑问代词、量词、连词、语气词、助词、副词、介词等的变化,探讨《老乞大》百年左右时间增删修改之处。进一步探讨其发展演变的特点,初步揭示元、明、清三代句式使用上的特点及演变规律。

二、汉语专门教材研究

关西大学的奥村佳代子将研究的目光聚焦于18世纪,从唐通事的会话资料与日本人的翻译资料进一步探讨直接的汉语接触与间接的汉语接触的区别。通过整理《译家必备》和《唐话纂要》这

两本书使用的词汇、语言和历史背景,奥村佳代子指出《译家必备》是由在长崎的唐通事所记录有关中日贸易的资料组成,书中所记载的代词、疑问词、语气助词等和当时的中国人所使用的并没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念起来也简单通顺,是记录唐通事和中国人对话的语言。而《唐话纂要》则是由在江户荻生徂徕主办的翻译社里当讲师的冈岛冠山所编辑的唐话书。《唐话纂要》分成六卷,奥村佳代子从卷一的二字话到卷六的《和汉奇谈》做了词汇和对话的整理,发现《唐话纂要》内部词汇的变化和《译家必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即间接资料文字越多,离直接资料越远。接着通过研究《忠臣藏演义》、《译阿州孝子文》以及由唐通事翻译《忠臣藏演义》后的《海外奇谈》,奥村佳代子发现:(1)从唐通事的会话资料来看,其中的词汇呈现出固定,单一的态势;(2)唐通事文学作品的汉语翻译与会话资料词汇相比,差异并不大,但也不能说完全一致;(3)汉语翻译作品和会话资料之间有明确的区别,汉语翻译作品中的词汇样式更多,而会话资料词汇则趋于单一化;(4)通过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词、语气助词的调查,在这些口的头话是单一且固定的,书面语则是多样而不固定。基于冈岛冠山的“唐话”资料里有带口头话的特征的部分,也有带书面语的特征的部分,奥村佳代子认为冈岛冠山的“唐话”其实可以认为是白话的一种了。所以,关于日文作品的汉语翻译或是唐通事的记录,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其词汇都是丰富多样的。厦门大学方环海教授对此进行评议,认为从《唐话纂要》的编写体例来看除了卷五和卷六外,这本教材从卷一到卷四的标题依次为二字话、三字话、四字话、五字话、六字话以及长短话等,每卷标题都以“XX话”的形式出现,由此可见,这个“话”就是冈岛冠山切分第二语言教学单位的基准。如此说来,《唐话纂要》中最为主要的表述核心是“话”,不论是二字话、三字话、四字话、五字话,还是长短话,都构成了《唐话纂要》最为重要的材料基础,也是最为基本的语言单位。

研究日本专用教材还有北京大学的林铭珊,她关注的是日本军用汉语教材。她总结了目前对于日本汉语军事用途教科书的研究成果,并且对二战结束前最后一本全集式军用汉语教科书《军用中国大全》以定性分析的方式分析其会话篇的内容,以日军在不同场景对不同人物的汉语会话设计为分类依据,考察了三类八项的会话内容。在第一类对中国平民百姓的对话以及为日军工作或者提供协助的中国平民百姓中,以是否无条件帮助日军为条件,划分出强制性的高低;第二类主要对于和战事相关人员,如俘虏或者敌军、共军等,反映了中国战场的残酷以及日军在极端军国主义的教育背景下设计的教科书内容;第三类则是日本基于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下,欲将殖民地纳入日本版图的会话内容设计。最后,她对日本的汉语教育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她认为在对日本汉语教育进行研究时,必须将日本不同时期的教育特征、历史背景纳入研究环节之中考察,除了靠着真实呈现文献史料,也必须对史料做考证和分析,才能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反思反省。

山东科技大学的徐丽、颜峰报告题目为《女性视角下的明治时期汉语教科书研究——以〈燕京妇语〉、〈燕语新编〉为例》,将研究焦点放在日本女性专用的汉语教材上,这些日本女性是日本外交、经商人员的家眷,是日本上层妇女。她们随着家人来到中国,在生活中需要和中国人打交道,因而也需要掌握北京官话。在这样需求下,出现了两部专门为女性编撰的北京官话教材——《燕京妇语》《燕语新编》。这两本女性专用教材在内容编排上针对女性的生活特点,偏重于日常生活的展现,同时这两部教材从女性的视角展现了晚清北京社会的日常生活及风俗习惯。在报告里,徐丽、颜峰从教材内容的编排、问答体的对话方式以及教材反映的近代北京官话的语言现象等分析女性视角下汉语教科书编撰经验的得失。其中,在语言现象里,报告总结出三个特点:(1)具有北京话口语特点;(2)语言正式典雅,用于上层社会的交流;(3)在语法上体现语言的阶层性。以“克”的用法为例,教材中的例子为:您家克了;刚唱过头一个戏克。其中的“克”实际上就是“去”。报告中引用胡明扬的观点,认为“去”读“ke(克)”显然是一个受社会尊重的语音,可以显示旗人的身份,受到人的尊敬,但在辛亥革命以后就消失了。因此这不仅是一种女性方言,也是一种阶层方言。

吉林大学文学学院的李春红则对1895~1945年朝鲜半岛汉语会话教科书的词汇进行研究。目前所见1910~1945年朝鲜半岛汉语会话教科书有30多部,该研究主要涉及其中最特殊的一类——以“满洲语”命名的会话书,主要包括《满洲语速成会话讲义录》《满洲语自通》《满洲语大王》《满洲语讲座》《满洲语问答会话集》五本。在全面梳理1895~1945年朝鲜半岛汉语会话教科书基本文献的基础上,李春红选取了以“满洲语”命名的汉语会话教科书为主要研究对象,阐述了1895~1945年朝鲜半岛汉语教育政策及教育意识的嬗变,主要考察了“满洲语”会话教科书的词汇特征及性质、语法特征及特殊汉语表达等,得出如下几点结论:(1)1895~1945年朝鲜半岛汉语教育政策随朝鲜总督府四次朝鲜教育令几经变迁,汉语教育也经历了从官方教育中断到逐渐兴起、从民间为主到官方支持的嬗变;(2)目前所见“满洲语”会话教科书集中出现于伪满洲国成立后的1934到1935年,其特殊的“满洲语”命名反映了日帝在朝鲜半岛普及汉语的本质。体例编排具有时代性及继承性,内容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也是1895~1945年朝鲜半岛汉语教育的一部分;(3)发现其口语特征及北方话为基础的语言性质,东北方言词汇多于北京方言词汇,但同属二者的方言词汇比重更大,明确了其方言并非单一东北官话方言,而是东北官话和北京官话的混合体;(4)教科书词类命名及分类的不一致性、词类成员归属的不一致性,都反映了当时编撰者的语法意识。其词类划分受到了同时期中国语法著作、朝鲜半岛语法著作及日本汉语语法著作的影响,已大致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早期现代汉语词类概念,并且教科书句法概念相对模糊,常“以词带句”;(5)最后,关于“满洲语”会话教科书中特殊汉语的表达。李春红指出,一方面通过对会话教科书特殊日源外来语复杂形态的细考,可以明确这一特殊词汇现象与当时日语的强势地位有密切关系,是日汉语言复杂接触及变异的结果;另一方面,通过对会话教科书特殊语法现象的分析,发现其不仅受会话教科书编撰者母语负迁移的影响,还受到目的语泛化及语言习得“调解”等交际策略的影响。

关于近现代汉语方言教材的研究也逐渐引起了相关专家学者的注意,汕头大学的陈凡凡的研究报告为《十九世纪西洋传教士方言教材编写研究——〈汕头话读本〉为例》,在报告中她指出,19世纪以来传教士、汉学家、海峡殖民地潮籍职员共同编写了大量学习方言的字典、词典、读本、语法书和《圣经》方言译本,对于这些资料多数学者主要关注它们作为历史语料的语言学价值,重在研究其反映的十九世纪潮汕方言的语言面貌,而作为汉语方言教材在域外汉语教育史上的价值未有人讨论。陈凡凡选取了目前可见的仅有的《汕头话读本》《汕头话口语语法基础教程》《汕头方言入门》《潮州方言入门》进行了相关的研究。研究从对外汉语教材评估的角度从教材语言、编排体例、教学方法、文化教学等方面对上述4本教材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评估,陈凡凡指出:教材课文的语言选用了鲜活的方言口语,体现实用性和常用性;编排体例多样,有以内容为纲,也有以语法为纲,但均以作者日常生活学习常见素材为基础;与当时其他教材不同,汕头方言教材并非采用当时比较通行的会话教材的形式编排,而是以单独例句的形式编写;教学方式多采用语法翻译法等等。

研究地域方言教材的还有浙江财经大学的刘亚辉、朱钱钱,华南农业大学的马之涛、深圳大学的宫钦第、香港大学的李兆麟。其中刘亚辉、朱钱钱、马之涛三人重点考察了关于宁波方言的相关研究。在《睦礼逊〈宁波方言字语汇解〉用字研究》一文报告中,刘亚辉和朱钱钱选取《宁波方言字语汇解》比较有研究价值的内容,对照《说文解字》《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台湾异体字字典》、字海网、现代所编各地方言词典等,根据这些字在辞书中的收录情况,将《汇解》分为三类进行研究。基于《汇解》的特殊性,刘朱二人认为,一方面《汇解》收录了一些其他辞书中没有出现的字,可为《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中华字库工程提供补充;另一方面《汇解》中提供的一些方言字的字义在其他辞书中也未见到,为该字补充了新义;此外,有些字虽然其他辞书也有收录,字义跟《汇解》记录也相同,但《汇解》记录了其在宁波方言中的一些特殊用法或词条。虽然同样是将《宁波方言字语汇解》作

为研究的素材,马之涛将观察到视角移向了《汇解》中的变调研究。在其《〈宁波方言字语汇解〉反映的19世纪宁波方言连续变调》一文中,马之涛发现在罗马字标记方面,《汇解》有着去其他文献不同之处,每一个词汇及短语中标有一个或以上的符号“ˊ”。对此,马之涛通过对宁波方言声调,即单字调及连读变调的分析,认为该符号应该反映着宁波方言的连读变调。通过对该种标记与现在宁波方言连读变调的比较,可以解释当时宁波方言连读变调调式的状态及特征。通过对重音符号的研究,马之涛发现重音符号所在音节正是宁波方言连读变调时音高较高的音节,这些标记反映着当时连读变调的状态。通过与今连读变调的对比,可以发现19世纪前字为阴平、阳平、阳去、阳入的两字组调式在相对稳定,而前字为阴上、阴去、阴入、阳上的两字组已经出现了H-与-H两种不同的调式。同时马之涛也指出,对《汇解》重音标记本稿只是做了比较初步的分析,要了解当时连读变调的整体面貌,还需要在今后对三字组及四字组作进一步研究。

宫钦第在《〈中华正音(骑着一匹)〉所反映的胶辽官话底层现象》一文中,发现《骑着一匹》记录了一些与今天东北方言不合的语音现象:全浊声母平声字清化后不送气,见系、精组与知章组声母合流。结合移民史,宫钦第认为这些现象可能是古代胶东移民带来的胶东方言的底层(全浊平声字清化后白读音声母不送气、精组与知庄章组字合流、见系细音节字有精组白读音)造成的。由此,宫钦第认为,处理外国学者编纂的汉语文献时,应对编纂者当时所依据的方言展开同步研究。

香港大学的李兆麟回顾与讨论了粤语二语教材的历史与发展,通过采取对比研究的方法,李兆麟以国外的相关期刊为切入点,讨论汉语二语教学热点。在研究报告中,李兆麟结合以传教士马礼逊为代表的传教士学习粤语的笔记,依次梳理19世纪至20世纪粤语教材、粤语教学法、早期的学习材料,早期的字典及粤语官方考试的演变与发展过程。在报告末尾,张西平教授在点评中指出,方言在第二语言教学习得中和汉语一样具有重要的价值,第二语言教学历史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历史,更应该直接服务推动当下的汉语教学。

三、汉语本体与教学的研究

在全球汉语教育史上,有关汉语本体的研究与教学模式、方法的探索一直居于重要地位,因此除对汉语教材研究之外,有关汉语本体与教学的研究也是本届年会的重点之一。在为期两天的学术会议中,共有十余位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华师大的胡范铸将“传教士语体”作为汉语的一种“社会方言”,他以最早期的汉语传教士文献为例,通过研究《天主实录》《斋旨》《圣经约录》《天主教要》等著作,着重探讨了两大问题:一是早期传教士汉语文献呈现出怎样的汉语特征;二是这些传教士汉语文献对于语言学理论、对于汉语的现代化、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在研究报告中,胡范铸归纳出早期传教士汉语文献中的文字特征、词汇特征、句法特征、话语特征。在文字特征方面,传教士汉语文献中的汉字偏旁强化类别表意特征,具体来说可分为使用简化字,如将“蛋”简化为“旦”;采用形声结合更明确的异体字,将具象或者抽象的人的动作特别是需要手的动作,都统一采用“提手旁”的用字策略;音译词语时,在同音字中选择带“口”偏旁的,甚至直接在同音字上加入“口”字旁,成为一个新字。在词汇特征方面,早期传教士汉语文献第一次规模引进天主教词汇系统,亚当、诺耶(诺亚)、口所熟(耶稣)等词在几部不长的文献中多达约120多个,同时也包括大量天主教的职务、行为、经典、观念。在句法特征方面,传教士的汉语文献可称为是现代汉语的滥觞,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数量结构的名词标记化(“一+量词+N”结构与“一+量+之+N”结构)、并列机构的多重标记化、被动结构的去消极化。在话语特征方面,早期的传教士汉语文献在修辞上以“文化迁就”策略弱化跨文化交际冲突,具体来说便是用“身份代入”策略和“观念比附”策略;而在翻译上,则采用“音译、意译、解说”并举

策略以弱化跨语言理解障碍;在文体上“经、戒、论”分体策略化解问题规范与弹性的冲突。

基于上述论证,胡范铸先生总结了早期传教士汉语文献的历史贡献:(1) 传教士汉语文献对于语言学研究的意义。传教士汉语写作提供了“语言接触”不同的案例,产生了不同于“洋泾浜语”和“克里奥语”的新语体,从而催生了汉语共同体语言文化发展的新格局;(2) 传教士汉语文献对于汉语现代化的意义。“救世主”“礼拜”等词标志了汉语与西方语言文化大规模交流的开端,有效丰富了汉语的词汇系统,推动了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发展;(3) 传教士汉语文献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意义。传教士汉语文献这种“异质性”的介入,相当有效地冲击了汉语固有的思想,从而刺激了中国传统文化更新的内在需求,传教士汉语写作中蕴含的西方思想概念,导入了一系列新的现代思想观念,更是直接成为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现代化历程一个重要的动因。

华中师范大学的董方峰的报告题目为《中国传教士语言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在文中,董方峰指出,传教士语言学既是一种语言学研究的范式,也是语言学学科史的一个研究领域,是当代学者对传教士语言学研究成果的整理、评价、比较、利用等活动的综称。传教士语言学既是对希腊——罗马语言学传统的继承和对欧洲语言的参照,又十分重视口头语言,并且兼顾为教学服务的功利性。但是中国知识阶层历来对传教士语言学的成就缺乏公允的评价,国内很少有学者把“传教士语言学”明确的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方向。在总结传教士关于汉语语音、汉外词典(包括方言)、汉语语法、汉语教学、汉语翻译六个方面的研究之上,董方峰认为当前传教士语言学应该成为语言学史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的专门研究领域,其对中国语言学的历史贡献应该得到公允评价。

苏州市职业大学的卞浩宇则将美国来华传教士裴德士的《汉语学习法初论》作为研究的重点。通过剖析教材的内容,卞浩宇归纳出《汉语学习初论》具有强调教学方法(如“直接法”“语法翻译法”“古安系列教学法”等);强调口语教学优先性(如“接受性口头语”“主动性口头语”“接受性口头语”“主动性口头语”);注重教学资料多样性等方面的特点。在报告中,卞浩宇以“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教学改革为例,阐述了由此带来的示范效应。

日本北陆大学的伊伏启子探讨的是早期西方人对汉语“量词”的分类以及认知的“量词”功能。在《马氏文通》(1896)中量词的内容在形容词范围内出现,17、18世纪早期西方人写的语法书里,“量词”属于“数词”范围,而且从术语上也能联想到“Numeral”一词。但是到了19世纪,“量词”渐渐被划到名词的范围中,并出现了各种描述它的术语名称“Generic term”“Classifier”等。量词的归类与从数词变成名词,研究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在解释方法上从“计算事物的功能”变成“分类名词的功能”。起初西方人将“量词”看成“数词”的一部分,后来把它看成“类别词”,并且将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词类。在报告中,伊伏启子以Lindley Murray(1795) English Grammar为突破口,通过这本书中的英语语法探索西方人如何分类与看待“量词”。同时她指出利用西方语言的冠词概念,可以在一些汉语语法书中看到冠词的章节,看到关于冠词和不定冠词的解释,从而进一步了解西方人如何定义与归类汉语中的“量词”。

在20世纪20年代直至50年代中期,世界范围内流行着一套由英国灵格风出版公司出版的针对外国人的汉语学习教材《言语声片》。《言语声片》由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系的三位老师编写而成,而其中的C.C.Shu就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当代文学作家老舍。《言语声片》成书于20世纪20年代,教材里头纪录的言语详细地保留了当时的北京话原貌。基于此,福师大的蔡建丰将《言语声片》作为研究对象,探索书中的北京口音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发展流变。在研究报告中,蔡建丰将《言语声片》与《语言自述集》进行了对比,得出了几个结论。首先,《言语声片》没有对汉语的疑问句进行分类并加以系统的介绍。但是经过对出现于各课中的问句及课后注释进行整理归纳,总结出了教材所介绍的五类问句共26个句式;书中的注释内容可归类为5个特点,这些特点集中反映了《言语声片》中的疑问句系统符合将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特点,值得当代的教学教材编写

者借鉴;再者,《言语声片》与《语言自述集》在疑问句系统方面存在着高度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体现了汉语疑问句系统在不同时期教材中的传承。

上海师范大学的马佳伟对传教士文璧及其汉语口语语法教材《中国北方口语语法研究》作简要的介绍,并对书中的名词、量词、数词、动词四个词类的教学作描述,以此来了解十九世纪后期传教士的语法观。马佳伟指出《中国北方口语语法研究》并没有单独列出汉字,而是以小说的形式来做内容的编排,在叙述中做分类。以词类来说,词类教学分析分为“构词法”和“名词分类法”,而名词又分成单音节、单音节重复、双音节三大类。此外《研究》也将句法和词类混在一起进行阐述。至于量词的部分,在书中作者删减了平常人们少用的量词,留下的多是“个体量词”,而“集合量词”则较少。基于上述研究成果,马佳伟认为《中国北方口语语法研究》并不十分适合初学者,只有对汉语口语语法有一定掌握的汉语学习者才能够较为了解书中所举例子与词性的叙述。

北京大学的李丽透过约翰·傅兰雅在中国的经历与在中国的成就试图梳理傅兰雅何以如此熟练地掌握汉语、融入中国文化以及他学习汉语的方法与途径。在研究报告中,李丽归纳出几点傅兰雅间接习得汉语的途径:(1)与中国同事合译科技书籍。在华期间,傅兰雅译介了涉及地理、历史、外交、政治等领域的书籍,在与多位中国同事的通力合作下,傅兰雅极大地提高了汉语水平;(2)与中国各类官员等结交使得傅兰雅可以熟稔中国文化,还能广结社会关系网,长时间的人际交往大大促进了他的汉语学习和运用;(3)其他传教士的提携帮助。为方便学习清政府的官话和“上流社会”的语言,傅兰雅曾特意投奔丁韪良的门下,在京师同文馆做英文教习,续编《中西闻见录》;(4)办学、办杂志等社会活动;(5)提倡小说竞赛,品评参赛作品。傅兰雅以自身二语习得者的角度看,从自身习得的体会经验出发,提倡并践行汉语的白话化、通俗化。

广州大学的许光烈以白乐桑“字本位理论”为切入点,讨论了白乐桑先生的汉语教学观。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字本位”理论,白乐桑本人对此并不是很认同,他多次表示“字本位”是被人贴上的标签,其观点应该概括为“二元论”,即字为一元,词为一元。许光烈指出当前学术界不少人应该是把白乐桑提出的理论与法语字本位、语素本位误读成“字本位”这个词。对于“二元论”,我们的理解为:汉语的书面表达形式是音节文字,而在汉语中,字义基本可以理解为语素义,字义是词义的基础,词义是字义的组合。许光烈指出白先生“词等于字”的观点或许是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因为西方没有字词之分的,所以要找到每一个字的意义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么该怎么把每个字的意义和语素连起来,体现出它的意义?许光烈结合白乐桑先生的汉语教学观提出,在教授者方面,要在注重字义的基础上来阐释词义;在学习者方面,也同样要在注重字义的基础上来理解词义。除此之外,许光烈还强调了要联系当下的网络用语,在环境中自然习得一些词义。

中央民族大学的刘晶晶对马来西亚华校非华裔学生的华语学习影响因素进行调查研究。截止2016年,马来西亚共有1298所华文小学,进入华校的华裔子弟维持在88%-90%,目前有65万名学生在华校就读,其中包括六万五千名非华裔学生。通过调查得知,选择在华校学习的非华裔学生华语学习成绩普遍较差,学习动力不足,这与社会环境、家庭、学校的教学与管理以及学生自身的内在学习动机有一定的联系。

法国蒙彼利埃三大、拉罗谢尔大学的张文杰以民间儒学复兴思潮下的法国汉语教学的历史与现状为考察和分析的目标。在报告中,张文杰指出,自1814年汉学家雷慕沙以《大学》为主要教材之一,于法兰西学院开设第一个汉语讲席至今,以汉学家为主导、与汉学研究紧密联系一直是法国汉语教学的传统。但近年来,法国汉语教学呈现出一系列新趋势,汉语教学传统出现分化。一是法国高校开设应用汉语专业,同传统的汉学专业(LLCE)双规并行,旨在提高语言应用水平的培训机构林立。二是随着21世纪以来第三代高素质华人移民的成长,华人民间力量崛起,使国内的文化思潮与法国汉语教学的互动更加频繁而深刻,例如法国儿童读经运动兴起。这样的传统嬗变既是

汉语教学推进、中国开放程度加深、吸引力增强的表现,也是汉语教学的挑战与机遇。张文杰首先勾勒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汉语教学发展史,重点考察不同文化思潮影响下的学习者的动机,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内容的发展变化,以及官方与民间教学的互动;其后分析现代海外私塾诞生与发展的观念逻辑、组织结构、教学特征、发展路径以及其对官方教学的借鉴意义;最后结合自身教学和参与文化活动的实践,重新探讨当今时代文化教学尤其是观念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的关系。

而首都师范大学的王宇则对新西兰中小学汉语教学进行研究。新西兰是世界上语言和文化超级多元的国家之一,目前各种语言加起来有160种。王宇通过数据分析、实地调查、案例和访谈等研究方法,梳理了多语言环境下新西兰中小学汉语教学的历史与现状,指出该国汉语具有后来居上、但中小学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王宇结合多语言环境因素分析了课程设置、教学模式和师资情况对上述特点的影响,并且从语言政策、政治、地理、文化等角度分析了汉语教学发展的制约因素,例如与目的语国家的贸易关系是影响外语学习首要因素,而目的语国家的支持依然是语言发展的重要动力。最后,她还指出新西兰未来语言教学多元发展的格局以及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汉语学习需求还将持续增长,同时要增加非母语教师的数量。

厦大的赵明从汉语本体角度研究明清汉语外来词演变中的用字选择。明万历年间,传教士率先入华,掀开了明清时期中西方科学与文化交流的序幕。传教士来华不仅带来了大量新知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汉语词汇系统。赵明探讨了明清汉语外来词用字选择的表现:(1)用字音节数目缩减,例如“巴拉西利”变成“巴西”;(2)选用相对更常用的字,例如“阿刺壁”变成“阿拉伯”;(3)用字提示人或事物的种属,例如音译兼意译的“乌托邦”其中“乌”在古代汉语中是“无”的意思;(4)选择古代汉语固有词形,例如“陡斯”变为“天主”;(5)音译成分逐步演化为合璧词,例如“佛郎察”变成“佛兰西”,最后变成“法国”;(6)用字选择逐步体现人们对事物的更科学的认识,例如“小西洋”变为“印度洋”;(7)音译形式音节语素化,例如“德意志”变成“德国”;(8)意译形式代替音译形式成为双音词,例如“豪骚考门斯”变为“下议院”,最后变为“下院”;(9)借用日语词形,例如“新闻纸/新闻报”变为“报纸”;(10)选择自造字。除此之外,赵明还分析了其用字选择的特点与规律:第一是用字数量选择上以双音节为主;第二是字形选择上以意译为主,包括两种形式;最后得出结论:外语也会影响汉语的造词。

在进行世界汉语教育的研究中,常发现很多汉学家会同时使用很多笔名或者在被记录时存在各种各样的名字,19世纪中叶普鲁士传教士、汉学家郭士立便是如此。日本爱知县立大学的王幼敏就对郭士立的中文名及笔名进行梳理、考订、厘清。郭士立会12种语言,能用6种语言写作。其早年在东南亚传教,19世纪30年代来华进行传教、办学、办报等多种活动,全程参加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是那个年代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其著述宏富,且所使用的中文名字和笔名也同样繁多,成为研究其生平和著述的一大难点。王幼敏列举出其笔名,有:郭实猎、郭实腊、郭施拉、郭甲列、居茨拉夫等。王幼敏根据郭氏在其英文著作《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中自述,在其离开暹罗来华之前,加入了当地一个原籍福建同安的郭姓宗族,取了一个中文名字“Kwo Shih-lee”,书中没有给出汉字写法。又根据郭氏所著《中文语法札记》的注音方法、黎子鹏编注的《赎罪之道传——郭实猎基督教小说集》以及同时期来华传教士伟烈亚力为郭氏所作的传记证实,“Kwo Shih-lee”确为“Kwō Shih-leě”之误,郭氏所自述的中文名应为“郭实猎”。最后指出其英文笔名有“Philosinensis、Scholastics”等,中文笔名有“爱汉者、善德者、善德”等。

《悉昙字记》是唐代解说梵文字母的经典教材,基于对此教材的分析,厦门大学的李柏翰从中考察梵学字音教材的编撰特点。他首先介绍《悉昙字记》的编撰框架,可分作三个段落:第一序文、第二“悉昙章”的全体构成说明、第三各章具体的切继法及其说明,又细分作“字母概说”和“十八章的拼合”两部分,其中字母概说部分留下了当时悉昙字母声韵的实际读法,也成为后人讨论唐代语

音特点的一份重要材料。其次他整理了此书在日本地区数百年的流传情况,并对其注解形式略作介绍,例如较早的注解本《悉昙私记》以问答体的形式进行注解,之后的《悉昙字记诸章建立畧颂》以五字歌诀的形式。最后通过《悉昙入门》和《悉昙梵文启蒙》观察梵学教材流回中国后的编写情况。梵学教材流回中国后,相关作者重述了悉昙字母拼合知识,汇编了相关类型文献,作为初学者学习悉昙字音的入门教材,间接体现了时人学习悉昙字音的个人体悟。综观当代梵语学习的入门教材编写,李柏翰发现多是大量讲述梵文语法变化,少数讲述字音和字体的拼合,并附带提及相关历史源流,这与《悉昙字记》的传承情况相当不同。李柏翰认为《悉昙字记》多阐述佛教义理与字母拼合方式,故不容易被归入汉语史教材的研究题材,而他的研究将能补充阐释悉昙知识概念对汉语字音分析方法的影响,亦能从悉昙学史的传承脉络连贯唐宋悉昙教材与日本悉昙教材的传承脉络,为梵学字音教材的流传提供较完整的说明。

日本关西大学的内田庆市的报告题目为《漫谈“您”》,认为域外汉语资料对汉语里的一些特殊现象是有帮助的,他分析了《语言自述集》《华语拼音妙法》《清文指要汉语》《汉语入门》里“您”的有关演化情况。在名为《世界汉语文教育的世界观》的报告中,金荣华先生指出全世界所有的语言都是平等的,语言的本身并没有高下之分,语言中的文化含义随着语言的传播而传播。他认为在中国古代,人们只说“早”而不说“你早”,因为这是中国上千年农业社会发展的结果,所谓“你早”就是“你比我勤奋”的意思;又如法语中,“干杯”一词具有预祝对方身体健康的含义,但是在汉语中“干杯”并没有“预祝健康之意”;不同的语言代表着不同的思考模式,这类差异不仅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也发生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语言之间,如“母鸡”和“台风”,在普通话中就是“母鸡”和“台风”,但是在闽南话中就是“鸡母”和“风台”。中西方的思维模式存在很大不同,中国的思维模式是属于人文对话模式,而西方则是对物,这也就造成了二语学习者学习汉语的难点。最后,金教授指出虽然语言是平等的,但是文字却是不平等的,文字的价值就在于其所记载的内容。

四、汉学领域上的新拓展

近年,站在“他域”的角度上考察中西方汉学理论日益引起汉语教学界的重视和探讨,如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会第八届年会的主题之一便是“国际教育研究的汉学新视野”。在本届年会上,有关汉学的研究依旧是重点之一,共有国内外十余位专家学者就“汉学”专题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关西大学的齐灿认为《华语官话语法》作为一部汉语语法书,其编写是为了汉语教学而非研究,书中涉及的语法知识虽多,但总体上较为零散。因此齐灿依据《华语官话语法》中万济国对汉语的描写分析,将其观点进行重新整合,在此基础上总结分析万济国的“汉语观”。齐灿指出,在《华语官话语法》一书中,万济国就汉语总体特点(语体、语音、语法)、汉语的声调、汉语的词类、句法、汉语中的礼貌用语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考察,总结出汉语在语音上音节有限、同音字众多且同音字连读时会发生音变;文体上话语不但存在高雅、中等、粗俗的文体差别,还存在官话、乡谈的地域差别;语法上汉语可按照拉丁语法划分出八大词类,量词是汉语异于西方语法的特征;句法上,话语只存在四种句型,两种主动句和两种被动句。关于万济国对汉语的评价,齐灿认为万济国对汉语观察细致,基本把握了汉语不同于西方语言的重要特征,并能较为合理地分析原因,但是万氏依旧难以摆脱拉丁语法框架影响,无法完全按照汉语事实分析汉语语法,分析上存在诸多错误。

复旦大学的宋桔则研究了19世纪的南北官话,通过历史文献梳理和文本解读来探究罗马字转写汉语从南京官话到北京官话这一转变的具体过程,以揭示威妥玛之外西人在这一转变中的历史贡献和作用。宋桔在《19世纪西人队北京官话的态度及第一个出版的北京话音节表》中对南京官话派(Nankingists)和北京官话派(Beikingists)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具体如下:

	基本特点	代表人物	观念特点	拼写系统
南京官话派	以传教士为主体,坚守南京官话是官方的标准音	裨治文、麦都思、卫三畏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北京官话的流行,但本质上仍坚守着以南京音为基础的转写系统的权威	直接沿用或小幅度修改了马礼逊以南京音为基础的拼写系统
北京官话派	以外交官为主体,推崇北京官话已普遍使用且成为了新的官话标准音	威妥玛、罗伯聃、密迪乐	北京官话的流行与政府官员及政府机构密写相关,并且也在商业范畴内通行,来北京的外交官和商人都(只)应该学习北京官话	任然沿用马礼逊的拼音方案

在对比南北官话基础之上,宋桔从罗伯聃的“矛盾”(即罗伯聃一方面在《意拾寓言》(即伊索寓言)中强调北京官话的重要性,在《正音撮要》中提醒学习者必须找一个北京本地人来学习;另一方面在这两本书中都沿用了马礼逊以南京话发音为基础拼写法)出发,重点探究了密迪乐对北京官话的研究。宋桔认为,密迪乐抛开诸多限制,以更精确、简洁为目标,积极开展对于专门的、单一的北京官话拼写系统的追求,虽然密氏在1847年的《随笔》中发布的第一个“北京话的音节表”十分简略甚至不完善,但仍在分类、选词、标记方式等多个方面影响了威妥玛的拼音系统。更为重要的是,从罗伯特到密迪乐,完成了从观念到实践,迎战主流,勇敢尝试的历史进程,为威妥玛的北京官话转写系统打开了大门。

日本爱知大学的盐山正纯以英文教材为资料初步探讨英文母语说话者近一百年的“官话”认识演变,他认为虽然以“官话”为概念及其语言上的特征等为课题的研究相继问世,但是中日两国学界针对“官话”的概念演变的研究却刚开始不久。因此在《19世纪法国人在课本中描述的“官话”认识》的报告中,盐山正纯以近代法国学者所编写的研究书、教科书为核心资料和考察范围,按照出版年代的顺序,考察了近代法国人(法语母语说话者)对“官话”这一语言事象的认识及其演变过程。为了使研究更加精细,盐山正纯将研究范围限定为19世纪上半叶,重点研究了朗热奈、德金、雷慕沙、巴赞、罗歇等人的著作,从这些著作中提取出法国学者对汉语“官话”概念的演变。盐山指出:19世纪上半叶的五个法国学者的中文研究,基本上继承了自马若瑟以来先行研究所提到的内容,同时法国学者的研究与英文话者的研究互为参照,可以看出在不同语言之间有着一些研究上的交流,虽然1850年之前的法国学者的研究没有提到英文话者将“官话”分为南北西三类的概念,但是以巴赞为代表的法语学者对“官话”的特征的描述非常深刻,予以相当具体的说明。这一事实说明,法语学者对“官话”的研究规模(数量)虽然不如英文话者,但是从近代西洋人对“官话”概念和特征的研究角度来看,他们的贡献不少,这值得今后继续研究。

同样,日本的福田亚细男则从图像进行汉学中的非文字文化研究。他认为了解过去的事物不仅可通过汉字和汉文,还能通过非文字资料,比如图画,因此提出了“画典”这个概念。他注意到,沿着画家描画的主题,人们可以发现当时不少被偶然记录下来的民俗性事象。通过查阅资料,福田亚细男发现旧有的解释有路神说和烽火台说,但这种说法并不具说服力,仍需进一步考证。通过在其他图中的寻找,福田亚细男发现在清朝乾隆皇帝南巡的画像中具有较高的出现频率,通过结合文献资料,最后这类物体可以确定是与哨楼和防汛官舍配套的烟墩、烟笼。福田亚细男总结认为,做“画典”的意义在于,能从图画中发现有趣之处,进行归类、思考、解释,再对应文字资料,这样能够更加全面的还原过去事物。

北京外国语大学李真在《试论18世纪英国早期汉学家对中国语言的认识》一文中,以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为中心,以其所著的《中国诗文杂著》中关于中国语言的论文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以此文本为原点折射出的18世纪英国早期汉学家的中国语言观及其特点做出梳理与总结。

李真指出,珀西对中国语言的认识主要集中在语音、词汇、文字、口语和书面语、方言和共同语五个方面,但在其著作中并没有关于汉语语法的知识点。此外李真发现,珀西的汉字观具有一定的矛盾性:一方面,珀西认为汉字比字母文字低下,汉字书写的困难阻碍了中国各门学科的发展,而中国学科的落后造成了中国文化某些方面不如欧洲;另一方面,珀西肯定了汉字的传承性,他认为正是因为中国任何人都可以学习汉字,并通过大量典籍、字典、文学作品等将其传承下去,汉字才不像埃及文字那样绝迹。李真认为,欧洲人的汉语认知在两个地域展开:以来华传教士为主的远东地区和以本土学者为主体的欧洲各国,这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共同形成了早期本土汉语研究者的特点:(1)从未到过中国,也不会汉语,但著作中所提供的中国信息包括中国语言的知识却相当丰富;(2)与来华传教士保持通信往来,掌握着传教士寄回的研究手稿或中国书籍;(3)在欧洲知识体系内将新信息新材料进行重新阐释和取用,尝试上升到学术研究的高度;(4)受到当时欧洲盛行的语言学观念影响,并渗透到对汉语的看法和分析中。基于英国国情的特殊性,李真将珀西的汉语观和英国海军准将安逊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官员诺伯的汉语观进行比较后,认为无论是安逊、诺伯,还是珀西,或是当时对中国感兴趣的其他英国学者,因时代局限性都很难对汉语作出全面、客观和深入的评判。《论中国语言文字》既凸显了珀西跟随当时主流评论对汉语有所轻视的态度,同时也体现了他没有人云亦云,进行了一定的批判性思考。这些可贵的认知经验为英国汉学进入发展期专业汉学家对汉语进行更深入和科学的分析打下了基础。

中山大学的陈淑梅通过分析梅辉立介绍中国文化的视角、方式及侧重点,进而对《中国辞汇》内容进行分类统计。首先陈淑梅简略地说明作者的生平与论著,接着着重介绍《中国辞汇》一到四部分的内容。陈淑梅指出书中人物无论在政治方面的经历或者哲学、思想方面的内容都得到详细的叙述,作者为的是增加中国文学学习者对历史、典故的了解。《中国辞汇》当中的很多人物都来源于小说,也几乎囊括了特定时期杰出的文学家或者有名的作品。书中以辞条的方法依照朝代列举个朝代的著名人物。陈淑梅认为,尽管辞条简略至极,但也说明,作者在参考各方面资料进行辞条的挑选时,除了考虑到历史文化背景、典故、成语、特定表达法以外,也考虑到了这些人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在向文学史致意。陈淑梅指出本书还是受到作者汉学背景以及个人阅读经验的影响。因此梅辉立对书中词条进行详略不同的处理体现出他重视典故“兼顾”文学史的心态,在有限的篇幅中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精华,为中国文学西传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浙江行政学院的黄佳从“决疑论”这个视角切入,研究明末入华耶稣会士如何运用“决疑论”的方法,适度调节天主教的教义、教规,以适应中国的传教环境,促成了明末在华天主教的大发展。“决疑论”是解决原则应用于具体情境所产生之道德困境的一个过程,也是当时耶稣会士培养传教士的一个重要科目。黄佳在报告中以处理“良心问题”为例,说明果阿圣保禄学院针对改教者受到的一些良心折磨,提出了决疑论式的解释,并说明在宗教教义、教仪上耶稣会士用“决疑论”寻找当时天主教理论与儒家思想之间相同或相似的立场,以学习双方的共同点,希冀能够有灵活传教策略与方法。这首先体现在耶稣会士自身的行为方式上:利玛窦进入中国之后所做的第一件改变就是改穿中国人的服装,先是僧服,后更换为官服。为了补贴传教经费的不足,耶稣会士还参加到海上贸易中去。其次是耶稣会与中国天主教徒之间宣讲教义、实施圣事的行为方式,再者对中国天主教徒的行为指导。此外,黄佳也强调了耶稣会士用“决疑论”的视角来看海外传教的高利贷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蒋向艳的研究报告题为《翻译中的文化迁移——耶稣会士韩国英法译〈诗经〉解析》,也涉及到了耶稣会士的研究。在报告中,蒋向艳主要以十八世纪《诗经》法译翻译语意含义为主,将研究的范围精确到韩国英神父翻译的诗经七首诗,以探求对中国诗文化对西方传教士而言传达着什么样的主旨?有着什么样的宗教思想?蒋向艳认为,韩国英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向欧洲读者介绍中国道德和统治的基础——“孝”。这里的“孝”意义是向天主、上帝尊崇的一种宗教的“孝”,

是基督教中的“孝”形象,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孝道”。韩氏在着重探讨《大雅·文王》《大雅·思齐》的基础上,从四个方面进行对这两篇诗歌进行了分析,分别是:(1)古代中国的宗教世界:天、上帝和文王的关系。韩国英营造的是一个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以“天”(音译为“le Tien”)、“上帝”音译为“le Chang-ti”)为这个世界的中心;(2)敬天法祖为孝:在透过翻译时韩国英将“像文王那样治理国家”转换为“像文王一样是奉天”在通过翻译将所蕴含的“孝”赋予基督宗教的内涵;(3)文王形象:文王在大雅的诗当中被塑造为一位圣贤之王,他有着近乎完美的道德,堪称后代君主与天下百姓之表率,有带领、领导的精神。因此早于韩国英翻译诗经篇章的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在其诗经译文中,就将文王拖谗为耶稣,之后的上古贤王也都曾被作为拖谗为耶稣在中国的化身;(4)大任形象“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无斁,誉髦斯士”,也因此文王那贤德的母亲是圣母玛利雅的拖谗。既不违背古代中国“孝”道之原义——对父母、祖先的遵从,同时也完美地与天主之道相合——尊奉圣子、圣父和圣母。我们可以从文本研究中清楚地了解,译文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古代的宗教世界及其主要角色蕴含着天主教神学寓意,同时在翻译上也没有违背中国古代道德基础——“孝”,原本世俗家庭里源于血缘关系的“孝”一变而为宗教意义上的“孝”。韩国英在译文中有意地植入自身的天主教文化,从而通过翻译实现了文化的迁移。

在现今汉语教育中,有学者注意到了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诗歌文化的继承。韩国江原大学刘立娟和南相镐便对现代韩国汉诗会活动与实际进行研究。现今韩国还保存诗会,韩国汉诗会为了继承传统文化脉络,在全国各地广泛地展开各项活动。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中,可知韩国汉诗会创立的目的是以诗养德,振作民风良俗,畅达传统文化。其追求的精神就是士君子精神,即以儒家哲学为基础的道德精神,在社会范围内起到模范作用,以其地位高、责任重的精神,因此士君子把“尊德性”与“道问学”均衡修养而要“从心所欲而不踰矩”的精神境界为理想目标,这是受到朝鲜500年间的性理学所影响。诗会审查标准以沈约的八病为基础,但缺少“字眼”的标准。此外刘南二人还认为要有“景、情、理、德、魂”的评价诗品的标准。在诗的内容上,韩国诗会的主体大体上按照行事目的而定,例如宣扬先贤之德、赞美名胜古迹等。最后,刘立娟和南相镐指出韩国汉诗存在的问题:其一是在作次韵诗时,字眼排在最后字位很困难;其二是作诗时吝啬感情表现。同时,他们也有新的摸索,即为了汉诗文化更进一步,开发合适的音数律,还要法古创新。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杨尊显以石仓教授的课程讲稿为研究对象,从日本对中国的讲述中,看日本学界对汉语研究的历史与演变,同时也提及石苍教授用动态的视角讲述了荻生徂徠其人对中国学问的研究不断成熟的过程并对其进行辩证客观的评价。其中的一个例子:“和尚”一词,早先发音为“ウシヤウ(くわしやう)”或者“ワシヤウ(わしやう)”,后来被发成“ヲシヤウ(をしやう)”。杨尊显发现当时“和尚”一词的发音已经接近现代日语的读法“おしょう”,认为五山文学时期对唐音和宋音的吸收促进了现代日语的形成和发展,也认为石仓教授为当代的读者还原了一个真实具体客观的前代学者形象,同时也在间接地提醒大家,在学术研究中一方面要注意对前人的成果批判性地继承;另一方面要重视学术道德素养。

台湾地区铭传大学的陈雅芳试着从多元文化融合的角度来讨论台湾地区的“民间信仰文化”。台湾地区的民间信仰是以闽南及粤东移民的信仰组成,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从本质上来说,台湾地区的民间信仰混合佛道儒三者,并以多神信仰的灵魂崇拜为基础,属于多神主义(Polytheism)。依附在信仰之上的祭祀行为不但有其宗教意义,更代表了一种文化意涵,是了解台湾地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媒介。陈雅芳从信仰之功能、祭祀神祇及祭祀活动三方面列举具体的例子来讨论。信仰之功能又分为两类:心理功能与社会功能,透过民间信仰可以给心灵带来慰藉、获得归属感与心灵上的安全感,同时还有族群认同和社群整合的功能。接着她介绍福德正神、王爷、妈祖、观世音、菩萨等五个较为重要的神祇,再进一步带出民间祭祀所用的牲礼、燃烛、掷筊等物品和

抽签、烧金纸、还愿等九种活动,还介绍了台湾地区民间较为特殊的祭祀活动,像妈祖绕进、抢孤和盐水蜂炮等每年都会举行的盛大祭典。最后陈雅芳再次强调,宗教之所以存在在社会中,乃因社会需要宗教。台湾地区民间信仰的教义、组织及仪式都与台湾地区文化及社会生活有关,民间信仰扮演着“文化认同”的角色,而庙宇及祭祀行为则成为民间认同自己文化的重要对象。

华东师范大学的邵雨以“苏轼历史观探析”为题,探析苏轼历史观的主要内容和特点。通过研究苏轼的生平及其所撰写的文章发现苏轼受宋代时代风尚和家庭背景的影响,对史学颇有兴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观。邵雨指出苏轼的历史观有几点特点:(1)正统观是为了解决乱世无君现象,并在其正统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名实说;(2)认为正有公正与私正之别,从国家的角度考虑,应当推崇公正而非私正;(3)苏轼非常重视历史人物的“德”,他引用《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见在他的思想中“德”具有很高的地位。另外一方面邵雨也提及到,苏轼看重“时”和“势”的重要性。言“时”是重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紧迫感和即时感。言“势”是突出历史中个体对大局的不可违逆。邵雨认为从苏轼的历史观可以发现他的缺点为历史观保守、小国寡民与思古慕古的倾向。苏轼认为改革是渐进式的,反对大刀阔斧,且封建等级观念和重文轻武思想会不时地在他对历史人物的批评中流露出来。邵雨认为苏轼的史学思想受到时代的局限和个人认知的制约有偏颇与保守之处,但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体现了超越时代的进步性,可供后世学者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林俊涛以《重思中国的位置——关于华语语系文学研究中的“中国性”》为题,试图重新梳理“华语语系文学”这一讨论领域的发展历史,介绍以史书美、王德威、石静远、周蕾等为代表的参与这一广泛讨论的汉学家如何展开论述,并将眼光放在中国当前的文学和文化生产上,重思中国的位置,以及何为“中国性”。他先以史书美的观点来说明“华语语系文学”命名的研究争论点,以“离散中国人”来看历史当中从中国出去的华人移民,即这些的华人的后代对于中国已经没有先辈那样的故国忧思,但是“离散中国人”和“海外华人”一词带着对少数移民意识形态的收编。因此,以“反离散”为“华语语系”的核心,以此来证明“华语语系”内部的复杂性和混淆性。而“华语语系”文学的命名和存在,则可以有效地消解掉由于过强的国族主义所编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那些被有意抹除的边缘群体发声。林俊涛提出王德威与史书美的论点的相异处,进一步论述王德威《后遗民写作:时间与记忆的政治学》中的“后遗民”论述。王德威认为“华语语系”文学的定义应当具有一个开放的边界,不应该将中国大陆不可忽视的文学、文化创造简单抛弃。对于“中国性”个学者都提出自己的观点,无论是周蕾将“中国性”处理为一个涉及种族、语言、现代性的理论问题,还是葛兆光把“中国性”融入到“亚洲性”当中,林俊涛认为作为最主要的华语文化生产地也同样有动态的、逻辑的、历史的声音来对“华语语系”研究做出自己的反应。对“中国性”的再思考,将是其中的理论重点。

华师大的卢守助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学习日语的方面。通过对梁启超与《和文汉读法》进行研究,卢守助指出,梁启超在流亡日本后逐步加深了对日语的认识,特别是明治维新之后关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文献。梁启超认为若中国想要崛起则必须要学习西方知识,那么中日两国必须合作,具体来说,便是日本人学习汉语,中国人学习日语。通过研究《和文汉读法》,卢守助发现汉语和日语在语法上存在差异,如汉文“游日本”、日文则云“日本二游フ”;日语句式中的不少词性以及书写上所用的名词均使用汉字,不用版名等日语规则。接着卢守助还将当中日语相对应的汉语词汇一一列出来,并对比了《和文汉读法》与《言海》词汇解释上的差异之处。卢守助指出虽然梁启超曾说“聪明的人只需一旬,愚笨的人只需两个月”,但考虑到日本平民十之九用方言,另外即使用汉字,日语中的字、义、音还是跟中文汉字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所以学习日本并没有那么简单。

五、国际视野下的汉语传播探究

本届会议上,有学者基于传播学的视角,将汉语的传播置于国际大视野之下,从历时和共时、整体和个别的角度出发,对汉语传播历史、规律、现象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其中,中央民族大学的吴应辉和何洪霞的研究报告题目为《东南亚各国政策对汉语传播影响的历时国别比较研究》。在报告中,作者对二十世纪以来东南亚国家汉语传播发展历程进行国别化比较研究后发现,东南亚多数国家的华文教育发展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波段共振性”,主要体现便是华文教育发展轨迹的“三起两落”。关于“波段共振性”,吴应辉和何洪霞对其的定义为“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期内,东南亚多数国家的对华外交政策、国家语言政策及其外语政策中的汉语教学政策都呈现出高度相似性,国家政策对华语传播的影响像波段一样起伏,且起伏的态势十分相似,时段大致吻合。”从具体的情况来看,可归纳为“三起两落”五段时期:自然发展时期(20世纪初至20年代末期)、严厉管制时期(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40年代中期)、恢复发展时期(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末期)、遭受打压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良好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值得一提的是,吴应辉和何洪霞基于国别化的视角,指出在“波段共振性”的大环境下,东南亚国家政策对汉语传播所产生的影响具有国别差异性,如马来西亚政府由于推行单元文化政策反而使华人社会更加团结,华人文化传承更加强烈,进而促进了华文教育;新加坡政府则推行以英语为主兼顾母语的多语政策,使英语逐渐转化为一个英语国家,而华语则正逐渐从华人的第一语言转化为许多青少年的第二语言。在此现象与规律基础之上,吴应辉和何洪霞提出了四点思考:(1)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决定语言国家传播的大方向;(2)海外华人华侨语言文化传承要遵循所在国法律规定;(3)汉语国际传播要避免意识形态冲突;(4)建立需求导向的东南亚汉语传播服务体系;

郑州大学的韩晓明从汉语传播规律的历史考察出发,认为汉语传播既遵循语言传播的一般规律,也有自己的规律。在论文研究报告中,韩晓明主要从“语”“文”分离与“植文”式传播;语言使用人口与汉语交际价值的转化、汉语传播意识到嬗变三大方面探究语言传播的规律以及相关的启示:1.汉字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先文后语”的过程,汉字是传播的先驱,而“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缺席的。这种状况的出现是汉语“语”“文”分离的特性所决定的。因此可以说,在早期的对外传播中,汉语“语”“文”分离的实在有意无意中成为了某种优势。但是到了16世纪,随着中西文明的碰撞,汉语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和其他语言发生接触,参与到语言之中的竞争,汉语汉字也在世界的语境下被重新评价。随之而来的便是汉语形象的改变和由此带来的在传播领域的影响;2.语言的价值主要分为:文化价值、经济价值、交际价值,其中因为语言所附着的所有价值只有发生了交际时才能体现,所以交际价值才是语言最基本的价值体现。语言的交际价值主要体现在人和人之间。所以,语言使用人口的多少,是影响语言保持和语言传播的重要因素。从语言传播历史来看,汉语无疑是语言保持工作做的最好的语言之一,这得益于长期以来强大的人口优势,而人口的优势往往会转化为语言竞争的优势。但是随着人口的作用日益弱化,纵然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但这并没有给汉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带来利好。在现代社会语言使用人口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语言保持。靠着人口流动、口口相传、手手相传而使语言发生大规模传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提升汉语的交际价值,越来越依赖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3.除了外部条件以外,语言传播意识也对语言传播有明显影响。汉语传播缺乏理论支撑、尚未形成自己独有的语言传播理念也是明显的事实。从历史来看,汉语的传播观整体上趋于保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语言观的保守、学习方式的单一、传播方式的被动。在报告的末尾,韩晓明提出传播意识和理论武器,是支撑汉语持续深入传播的坚实后盾和强大助力。时至今日,汉语大规模走向世界,不但需要积极的语言

传播意识,还应该形成科学的语言传播理念;不但需要丰富的传播手段,还需要有坚实的理论支撑。这些都需要在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中摸索。

相对于上述三位学者将汉语传播置于历时的国际大环境进行研究和探讨,北京语言大学的田然则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共时层面中的具体国家,在《英国谢菲尔德地区汉语教学与拓展研究——以英国谢菲孔子学院为个案的分析》报告中,田然首先回顾英国汉语教学与研究现状,以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为个案,探讨了其建立七年间的扩展情况。田然提到,目前在谢菲孔子学院开设的相关项目主要包括:孔子课堂拓展、教材编写拓展、商务汉语教学拓展、科技汉语拓展、龙文化艺术学校拓展、商务论坛拓展等。此外,田然也根据自身在英国教学的经验总结出孔院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所遇到的教学问题和文化传播问题,如非目的语环境造成的负迁移、本土教师和外派教师之间的矛盾、文化交流限于表层形式而未能进入深层内涵。文章在探讨谢菲尔德孔院在着重关注语言与文化、语言教学等学术问题的同时,也积极探索了孔院在塑造和平中国形象中的作用,这对其他新成立的孔院的进一步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云南开放大学的张入月和王培闽则将研究的目光向前追溯至明清时期,从明清两代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移民方面交往的史料与文献中,梳理汉语在暹罗的教育和传播情况。张王二人认为,在中国与暹罗的交往中,汉语的传播主要得益于两方面:一方面是朝贡贸易的交流需求和贡品之间的相互流通推动了汉语传播;另一方面则是华人移民促进汉语在暹罗的传播。在此基础上,张入月和王培闽归纳并对比了明清时期汉语在官方层面和民间层面传播的特点:(1)官方层面汉语传播的特点:A.以满足朝贡贸易为主,促使官方培养汉暹双语翻译人才;B.以促进双方友好交流为目的,赠送汉文典籍、书法物品,间接达到传播汉语的效果;C.与朝贡贸易相关的人群在与中国宫廷、官员的接触中,产生对汉语的兴趣,从而学习汉文、索要诗文;(2)民间层面汉语传播的特点,体现在:A.以华人移民所引起的汉语、汉文化传播为主;B.华人移民的将中国古典小说的汉文文本等带到暹罗,通过文本阅读和口语讲述的方式进行了传播;C.大量的华人移民尤其是“皇室华人”潮州人在暹罗的数量和社会地位都占优势的情况下,潮州语也对泰语产生影响,部分潮州词语进入泰语;D.华人想要在异土传承中华文明的愿望,使得家庭教育以多种方式让子女接受汉语及汉文化教育。基于上述特点和研究,张王二人认为,中暹两国虽然来往密切,但汉语在暹罗的教育与传播在满足官方政府交往之后便未再进一步得到重视和推广,相较之下,民间由于贸易往来、汉文典籍传播、华人开设儿童学校教习汉语等较为活跃,尤其是在清朝末期曼谷开设了第一所华校,实现了华校零突破。

与之前做报告的几位学者不同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的肖路基于传播媒介的视角,以华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本科高级汉语阅读课程为研究对象,通过半结构式访谈了解阅读课受众课外汉语媒介接触的情况及其困难,从而进一步丰富汉语课堂媒介的传播方式,优化课堂媒介中的传播内容,以使受众获得更好的课堂体验。肖路指出,学生学习汉语的需求可以分为学习需求和专业需求。在学习需求层面,接受访谈的修读华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本科高级汉语阅读的学生中有80%的首要需求是能找到工作。换言之,找工作是其接触汉语的首要原因。在专业需求方面,肖路通过调查发现,实现专业需求的首要条件是能顺利完成4年的本科学习,获得规定学分,通过HSK6级考试,完成一篇万字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者可获得本科学位证书。经问卷调查和访谈,学生接触汉语的媒介主要为:大众媒体、人际交流和课堂是他们接受专业汉语传播的重要途径。其中,大众媒体中以网络为主。但是在接触传媒的过程之中,学生也面临着词汇语法、选材、实时反馈等问题。基于此,肖路指出,在课程设置时应该考虑到接近受众需求,调整阅读内容;丰富课堂媒介的传播方式,加入群体传播方法;利用网络平台,连接课内与课外。

法国汉语总督学白乐桑先生做了一个特别的大会报告,分享了西方汉语传播与自己学习汉语的动机,他认为他个人的学习动机不是什么旅游、学习兴趣等等,而恰恰来自个人在法国所处的边

缘化身份,这或许给我们研究汉语学习动机提供了一个主要的思考向度,或许很多的汉语学习动机背后还有更多复杂的因素制约。

六、结 语

早期的汉学家们编写了相当数量的汉语学习手册和双语词典,目的是将汉语知识按照其他语言的认知规律进行编辑整理,如着手编写有关汉语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著作,学习、教授汉语并尝试编写教材等,其目的固然是为外国人学习汉语和传教士布道之用,但这些教材、论著、字典本身就体现了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既有利于西方人学习汉语,又增进了国际上对中国的了解,他们作为汉语的学习者、教学者、研究者与传播者,无形中将其他语言的分类方法运用到汉语上,同时也为汉语特有的知识体系创建了新的分类,他们在汉语研究上取得的成绩是多方面的。

可以说,在汉语国际教育风起云涌的今天,汉学家对汉语与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他们不仅将汉语著作翻译成各种语言,而且将中国文化与汉语思想介绍到国外,特别是在汉语研究领域,这些早期的汉学家们将汉语知识整理成系统的语法和教科书,也将汉语转化为拉丁语字母,编撰成最早的汉外语言词典,承担了汉语传播的历史重任。中外交流的日益密切,这一方面促进了国际汉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向中国引入了国外的语言学习方法和理论,这些汉学论著、汉语教材、汉外词典、经典翻译业已成为研究全球汉语教育史的重要资料,仍然有值得借鉴的学术价值。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f Chinese Global Education History

SONG Xudong & DU Xiayang & XU Yijia & FANG Huanhai

(Overseas Education Colleg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102 China)

Abstract: Chinese global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a point of special interest in the current academic system, to intensify the research topic that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eaching in all over the world, but also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and experience for the current Chinese teaching. The discussion cont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eminar of Chinese Global Education —— the 9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World” include the study of Chinese textbooks,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Chinese, Chinese ontology and other fields. These provide new ideas, new methods and new material for the current academic system of Chinese educational history studies.

Key words: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eaching materials; Chinese ontology; sinology